

章猷才◎主编

新中国成立以来 重大历史事件

—— 回顾与思考 ——

XINZHONGGUO CHENGLI YILAI
ZHONGDA LISHI SHIJIAN HUIGU YU SIKAO

013039136

K270.5
29

XINZHONGGUO CHENGLI YILAI
ZHONGDA LISHI SHIJIAN HUIGU YU SIKAO



新中国成立以来 重大历史事件

— 回顾与思考 —

主 编：章猷才

副主编：王立新 杨明清 林学启



北航

C1648169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K270.5
29

01308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与思考/章猷才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35-4700-3

I. 新… II. 章… III. 中国历史: 现代史 - 历史事件 - 党校 - 教材 IV. K2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8976 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与思考

责任编辑 司 时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高 鹏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625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出版说明

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安排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需要,结合教学工作实际,我们在市厅班、中青班等班次开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专题教学的课程。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评介历史史实,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探索党领导各方面建设的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教学实践的情况看教学效果很好,颇受广大学员青睐。

为此,我们在原来专题课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高,采用最新资料,吸纳前沿科研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力争写出一部反映历史全貌、适合党校教育、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有助于提高干部执政能力、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教材。

目 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为巩固政权采取的措施·····	(1)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形势·····	(1)
二 党和国家为恢复经济采取的措施·····	(2)
三 党和国家为巩固政权采取的措施·····	(7)
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	(13)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实施·····	(17)
一 “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形成 ·····	(17)
二 “一边倒”外交战略形成的原因 ·····	(19)
三 “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特征 ·····	(23)
四 “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实施 ·····	(23)
五 “一边倒”外交战略的解体 ·····	(25)
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意义·····	(29)
一 朝鲜战争的爆发·····	(29)
二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过·····	(32)
三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	(40)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思想批判运动·····	(44)
一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44)
二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	(47)
三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	(51)
“高、饶事件”及其经验教训 ·····	(55)
一 历史上的高岗、饶漱石·····	(55)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次争论·····	(59)
三 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	(65)
四 对高岗、饶漱石的处理·····	(71)

五 高、饶事件的经验教训·····	(74)
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	(76)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76)
二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79)
三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4)
四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86)
党的八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90)
一 中共八大的基本情况·····	(90)
二 中共八大的主要贡献·····	(94)
三 中共八大制定正确路线的原因及启示·····	(100)
1957 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05)
一 整风运动的发动·····	(105)
二 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	(108)
三 “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和严重扩大化·····	(115)
四 评价与思考·····	(119)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经验教训·····	(126)
一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背景·····	(126)
二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酝酿和发动·····	(129)
三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行过程·····	(132)
四 初步纠“左”的失败与继续“大跃进”的恶果·····	(137)
五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危害和教训·····	(139)
1959 年庐山会议·····	(142)
一 庐山会议的基本情况·····	(142)
二 庐山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	(146)
三 庐山会议的启示·····	(154)
七千人大会与各项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156)
一 七千人大会·····	(156)
二 各项建设的恢复与发展·····	(161)

城乡“四清”运动·····	(165)
一 “四清”运动的缘起·····	(165)
二 “四清”运动的经过·····	(170)
三 “四清”运动的评价·····	(179)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82)
一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182)
二 两个对立的中央文件·····	(187)
三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192)
四 派工作组之争·····	(195)
五 八届十一中全会·····	(199)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历史贡献·····	(202)
一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背景·····	(202)
二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经过·····	(203)
三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贡献·····	(208)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历史意义·····	(212)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准备·····	(212)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213)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219)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222)
一 南方谈话的时代背景·····	(222)
二 南方谈话的经过·····	(224)
三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	(229)
四 南方谈话的重大反响和历史意义·····	(232)
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研究·····	(236)
一 台湾问题的由来·····	(236)
二 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演变·····	(238)
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两岸政策的新发展·····	(247)
四 对台湾问题的瞻望·····	(249)

“一国两制”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251)
一 国内外形势变化与香港、澳门回归的时机选择	(251)
二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顺利发展,香港、澳门回到祖国怀抱 ...	(253)
三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重大意义	(260)
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西藏问题的演变	(263)
一 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入侵和西藏问题的由来	(263)
二 西藏的和平解放	(265)
三 1959 年的武装叛乱	(270)
四 西藏问题的公开化和国际化	(273)
五 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278)
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与经验	(282)
一 历史的伟大转折与改革开放的起步	(282)
二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285)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287)
四 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94)
五 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298)
后 记	(303)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为巩固政权采取的措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人民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和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但是，新中国是在长期的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家经济、巩固新生政权，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包围，同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形势

（一）政治上，新生的人民政权亟待巩固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战争虽然已经基本胜利，但是全国还未得到彻底解放，国民党反动派仍组织上百万的军队在西南、西北、华南和沿海各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在溃逃台湾时留下了200多万武装土匪、60多万特务分子、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各种反动势力，他们与当地的黑恶势力相互勾结，以各种方式进行捣乱和破坏，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大批谍报人员和敌特分子不仅收集新政府的各种情报随时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还以各种极端的手段，如暗杀新政府党员干部、抢劫杀害普通百姓等来制造混乱，扰乱社会秩序，诋毁共产党形象，给新政府施加压力。此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还有3亿多农民没有分到土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解决。

（二）经济上，财政经济状况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在财政经济方面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国民党政府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工农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第一，经济布局不平衡，只占全国经济10%左右的、规模很小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几个城市中。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技术落后，部门行业残缺不全，没有独立的机器制造业。第三，工农业产品产量低下，工业产品产量与先进国家差距甚大，农业技

术水平落后，粮食产量低。1949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和战争的破坏，全国的钢产量只有15万吨，煤产量3200万吨，粮食只有2100亿斤，棉花只有850万担，许多日用工业品都需要进口，如玻璃杯、牙膏、图钉等都不能自己制造。第四，市场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物资奇缺、失业人员剧增。此外，1949年，由于农业水利设施失修造成1亿多万亩农田受灾，4000多万农民成为灾民，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城乡凋敝、失业成群、哀鸿遍野。而500多万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由于前进迅速，战线拉长，军费开支巨大，1949年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负担。

（三）国际上，新中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之中

新中国一成立，就得到了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印度、缅甸、瑞士等国通过谈判，确定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与新中国建交。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了与苏联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新中国的成立也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防线，宣告了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失败，大大增强了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甘心它们在中国的失败，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继续支持国民党反动集团，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此，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方位封锁包围中国。政治上，不承认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继续支持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经济上，资本主义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实行封锁、制裁、禁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宣布没收中国在美国的所有公私财产；军事上，美国操纵联合国，组织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将“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二、党和国家为恢复经济采取的措施

（一）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新解放区还有3亿多农民没有分到土地，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党和政府决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出了当前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八大任务，其中土地改革是八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

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房屋，“统一的、公平合理的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不得侵犯民族工商业，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等。

1950年冬，南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的全面展开。此次土地改革，我们借鉴了以前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有领导、有步骤、分期、分批的进行，每期土改一般都要经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四个步骤。土改前，先对农民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训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到农村工作，领导土地改革；改革中，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地改革的主要执行机关，组织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引导他们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到1952年，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土地改革使近3亿农民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加上老解放区解放前的土改工作，全国90%的农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党的土地运动上一次涉及人口最多、动员范围最广、政策比较严密、运作比较规范的土地改革。此次土地改革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基本实现了全体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土地个体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因此空前高涨。广大农民添置牲畜、水车和新农具，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和扩大经营，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①，农业生产状况得到根本改善。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28%，1952年比1949年增加40%左右，棉花等工业原料作物的产量1951年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②，新政权因此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二）没收官僚资本，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占全国资本的2/3，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航空、船舶等重要部门，垄断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其中，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四大家族，占有全国80%左右的工矿和交通运输业资产。没收官僚资本收归国有，可以构建起新社会的国家经济基础，通过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865—866页。

^② 《三年来新中国经济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16页。

展国家资本主义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没收官僚资本不同于打碎国民党的旧国家机器，为了保障社会经济的平衡运行、渐进过渡，必然采取措施保证原有官僚资本的正常运行，以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因此，在没收官僚资本收归国有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按照官僚资本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由军管会将其完整接受下来，立即恢复生产，然后逐步对其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在没收官僚资本的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把企业的接收和恢复生产有机的结合起来，保证接收过来的企业照常运行、机器照常运转、人员照常工作，军管会的职责只是监督生产，不是管理生产，完成军事管制后，迅速将所接收的企业交给相关部门进行管理和经营。到1950年初，全国共计接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多家，金融企业2400多家，工人75万。1951年1月5日和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彻底清理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将其收归国有，最终完成了官僚资本的没收工作。整个没收和接管工作十分顺利，基本没有出现生产停顿、设备被损坏等状况，原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多数保留了下来，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没收官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国营经济使新政府迅速掌握了能源和许多生产资料的生产，控制了金融、交通、通讯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从而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并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连同革命根据地原有的公营经济，初步构建起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三）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充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数量上占到90%左右，这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增加工业产品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增加商品流通量以促进城乡交流、吸收工人就业、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带有天生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也带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很多民族资本家也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依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并举的政策，使其有益于国计民生，限制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中国的民族

资本主义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始终作为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附庸存在。在私人资本中，工业资本只占 1/5，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 4/5，而后者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如果管理不善，会对市场秩序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1950 年 5 月，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工厂大量停业、工人失业，很多资本家产生了恐慌心理，认为共产党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为此，党中央决定合理调整工商业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使私营工商业在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指导下迅速发展起来。1950 年 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为此，我们必须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因为我们的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国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因此，在充分考虑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特点之后，党决定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既要充分保持私人资本主义旺盛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服务，又要对其加强管理，使其在国家规定的价格和经营范围内经营，为城乡物资交流服务，即私人资本主义只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并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为此，我们对其中有利于国计民生而无独占性的行业、供应当地居民需要的工业和经济文化事业、经营次要农产品、畜产品等有利于城乡物资交流的行业，采取鼓励的政策；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如粮食、棉布、盐、煤以及奢侈品和供给量已达饱和的生产事业，则采取限制的政策；对于投机商业则坚决取缔。

1952 年，“五反”运动开展以后，市场上物价上涨、交易停滞，很多资本家产生了新的疑虑。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保护工商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党中央决定区别对待，将工商业者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种，以严格控制打击面。在“五反”运动后，中央和各级政府进一步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资本家获得合法利润。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受到削弱乃至淘汰，私人资本主义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

事实证明，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是党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做出的正确选择，它极大地促进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效地充实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社会主义改造做了重要准备。

(四) 稳定物价，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国民党政权灭亡之际，国家财政金融已经崩溃，而且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向全国进军的战事消耗巨大，新中国也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人民政府入不敷出，暂时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亏空，以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投机资本借机继续兴风作浪，凭借他们在市场上的经济力量，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进而加剧了物价的上涨速度，从1949年8月到1950年2月，市场上出现了四次物价大波动，整个市场一片混乱。为了根本改变这种混乱状态，降低物价，稳定市场秩序，党和政府强势出击：一方面，积极恢复生产，增加社会供给。大力支持国营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大力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建立供销合作社以加强工农业产品的收购和调运工作等。另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打击投机资本。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明令禁止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流通，确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1949年6月，军管会断然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200多个投机商，基本制止了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与投机商之间的“银元之战”取得胜利。在金融市场上失利的投机商们转而囤积粮食、棉布和煤炭，哄抬物价，扰乱市场，针对投机商们的这一不法行为，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和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在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集中抛售，导致物价迅速下跌，一举粉碎了投机商的阴谋，使他们因资金周转不灵而纷纷破产，“米棉之战”也取得了胜利。通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的胜利，投机资本的冒险倾向基本被消除，市场秩序逐渐趋于稳定，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为了进一步稳定物价，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该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于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集中起来合理使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国营企业的现金除留出一部分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该决定是要集中使用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物力，避免财力、物力的分散和浪费，以争取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同时，政府还紧缩编制、加强税收、节约开支等。在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国家也迅速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平息了物价的频繁波动，短期内消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通货膨胀基本停止，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物价日趋稳定，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经过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在短短三年间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50年到1952年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1.1%，1952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三、党和国家为巩固政权采取的措施

（一）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乘胜追击，分路向西北、西南、华南进军：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进军，扫清了大股马匪，巩固住了西北边疆；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各一部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进占贵州，随即直入川南，同时进击川东，向重庆合围，重庆解放后，和一野部队合围成都，歼灭了胡宗南集团；第四野战军分东、中、西三路挺进广东、湖南，先后取得了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和广西战役的胜利，歼灭了白崇禧集团，解放了广西全境。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第三野战军向东南沿海进军，发动了对金门等沿海各岛屿的攻击，解放了沿海大量岛屿。1950年6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之外的全部中国领土。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得以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和香港、澳门外，全部国土都获得了解放，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与此同时，配合全军作战的步伐，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人民解放军还在新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剿匪工作坚持军事清剿和政治争取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对土匪、特务和其他反动武装展开了清剿斗争，共计歼灭国民党土匪武装近百万人，基本平息了匪患，稳定了社会秩序。

（二）建立各级政府，巩固新生政权

各地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立即着手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随军带有大量的地方干部，每到一处就迅速建立各级政府，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此，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党首先在各新解放区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成带有军事性质和临时过渡性质的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没收官

僚资本，组织恢复生产，并负责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保护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及时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领导广大人民参加政权建设，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讨论决定当地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改革措施，同时通过自上而下的委任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建立起各级人民政府，以实现党对政权的现实领导，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管理国家政权的权利。1952年底，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已经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加强，到了1953年3月，全国已有23个省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94.8%的县也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也逐渐改由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会议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个有效的基本组织形式。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也逐渐建立，各级干部们认真组织和领导国家开展的各项工作，政府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三）镇压反革命，肃清反动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但是遗留在大陆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等反革命分子与国际上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疯狂地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对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构成极大威胁，人民政府虽然也采取过一些镇压措施，但不够坚决彻底，甚至还出现了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打击不力的右的倾向。朝鲜战争爆发后，反动势力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各种破坏活动更加猖獗，他们疯狂地破坏工厂、铁路、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甚至组织骚乱，围攻基层政府，杀害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仅1950年新解放区就有40000多名干部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他们甚至还策划在国庆一周年庆祝活动时，炮轰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极端行为极大的危害了社会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杀掉这些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权就得不到巩固。为了肃清这些反动力量的威胁，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运动中的“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运动，坚决惩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其中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此次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运动还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全民动员，检举和揭发各类反革命分子，专政机关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既要注意策略，不要杀错，但也要坚决杀掉应当杀的反革命

分子。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规定了基本的量刑标准。在这些指示和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让党的镇压反革命政策深入人心，同时又公开召开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群众大会和公审大会，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广大群众纷纷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并协助公安机关逮捕反革命分子归案，运动达到高潮。1951年5月，针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和草率现象，镇反运动收缩范围，集中处理积案，重点惩治罪大恶极，为人民深恶痛绝的反革命分子，罪行不太严重又愿意悔改的，可以宽大处理，1951年10月，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被扫除，很多盘踞多年的宿匪基本上被肃清，许多城市的黑恶势力也基本上被消灭，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四）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新旧社会和新旧体制的转型时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在中国社会还有相当影响，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也不满足于只得到15%~30%的利润，开始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和经济情报的方式牟取暴利，这些不法行为既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又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腐蚀了广大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一些老党员干部以“功臣”自居，个人主义膨胀，迅速腐化堕落，而一些新党员干部官僚风气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1951年秋，全国出现了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贪污各种公款达171万，中央人民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贪污人数竟达1670人。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对党和国家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为此，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因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页。